

民俗采风

胶东“四大”顺口溜

张发山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四”早已超越了单纯记数的功能，被赋予深厚的哲学意蕴，渗透进自然规律、思想观念与日常烟火。它既对应“四时有序”的天地节律，又在民间智慧的滋养下，衍生出五彩斑斓的文化表达。从推动文明进程的“四大发明”，到标志文学巅峰的“四大名著”；从寓

意吉祥的“四喜临门”，到反映农事周期的“四时八节”，“四”始终绵延在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。胶东民间百姓便以“四”为引，创作出一系列充满市井机趣的“四大”顺口溜，用朴实诙谐的话语摹写人生百态、世间万象，将数字文化演绎得鲜活可触、妙趣横生。

溯源：从《神童诗》到民间变体

“四大”顺口溜究竟起于何时？遍查史料，并无确切的诞生纪年可考。它大约并非某位文人于特定时点的孤篇创作，而是根植于先秦民间歌谣与数数歌，在宋元繁盛的市井文化中逐渐成型。北宋汪洙《神童诗》中的“人生四喜”，可视作这类文体的雏形。

汪洙，字德温，鄞县（今浙江奉化东）人，宋徽宗元符三年（1100）进士，九岁即以赋诗闻名，时称神童。初任明州教授，后累官至观文殿大学士。《神童诗》辑五言绝句三十四首，是旧时广为流传的训蒙读物，私塾先生多以此为启蒙课本。其中《人生四喜》这组雅俗共赏的经典，恰似一粒种子，在民间沃土中生根发芽，衍生出无数变体。当“久旱逢甘霖”的农耕记忆邂逅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漂泊情怀，当“洞房花烛夜”的生命礼赞碰撞“金榜题名时”的功名梦想，这种四句一组的表达结构，便深深植入了民族的文化基因。

南宋学者洪迈在《容斋随笔·卷八·得意失意诗》中记载：“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‘久旱逢甘雨，他乡见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挂名时。’好事者

续以失意四句曰：‘寡妇携儿泣，将军被敌擒。失恩宫女面，下第举人心。’此二诗，可喜可悲之状极矣。”

明代朱国祯《涌幢小品·卷二十二》载：成化戊辰年间，有王树南者，于每句前各添二字，成“十年久旱逢甘雨，万里他乡遇故知。和尚洞房花烛夜，教官金榜题名时”，将喜意推向极致，读来令人称妙。

然而，民间最擅长的恰是“解构”与“再造”。当雅诗流布市井，普罗大众随即注入自己的解构。相传一位落第秀才归家途中，满心郁结，便给每句“喜事”各添一句反转注解：“久旱逢甘露——一滴，他乡遇故知——债主。洞房花烛夜——梦中，金榜题名时——重名。”这一添，意境顿转，高扬的欣悦瞬间跌入荒诞的窘境。此版本流传之广，几不亚于原诗，也标志着直面生活苦涩的诙谐俚谣，自此在民间扎下了根。

人间既有“四喜”，自然也有“四悲”：幼年丧母，人生初始便失依怙；少年丧父，前路茫茫失引航；中年丧妻，半生伴侣一朝离散；老年丧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乃生命至深的绝望。

解码：民间修辞与文化智慧

这些来自乡野的顺口溜，实则是老百姓对生活与社会的另类解读。“四大”顺口溜通常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，修辞上多用“同类归项”或“意象叠加”，把看似无关的事物串成有味儿的四句话。如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“四大怪”：“窗户纸，糊在外，反穿皮袄毛在外，大姑娘叼支长烟袋，养个孩子吊起来。”寥寥数语，勾勒出关外独特的民俗画卷。又如胶东、胶南沿海的“四大鲜”：“加吉头，鲅鱼尾，刀鱼身子唇唇嘴。”加吉鱼头部脂丰，鲅鱼尾肉质细腻，刀鱼腹段油脂盈润，松鲷（俗称唇唇鱼）鱼唇尤为鲜美，皆深得民众喜爱。

“四大”顺口溜的创作常运用“概念整合”的思维。如“四大娇贵”中，“木匠斧子，厨师刀，光棍行李，寡妇的腰”——看似荒诞的组合，细品却深刻揭示了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。这类俗谚，暗含传统社会微妙的人际规则，恰似多棱镜，折射出民间社会的复杂光谱。

比喻修辞在“四大酸”中尤为巧妙：“四月青杏，野山枣，争风的娘们，

老陈醋”，将味觉之酸与情感之酸悄然勾连。对偶则在“四大直”中淋漓展现：“木匠尺，瓦匠线，纺花轴子，雕翎箭”，借职业工具的属性传递正直的价值观。再如“四大急”：“火上房，狼叼羊，孩子趴在井沿上，提着裤子找茅房”，通过押韵与急促的节奏，将紧急情境描摹得跃然眼前。

当然，有些“四大”顺口溜听起来略显粗粲，却胜在通俗上口、过耳不忘，既能令人会心一笑，也可品出几分道理。如形容生活艰辛的“四大苦”：“黄连水，猪苦胆，没娘的孩子，光棍汉。”前两句说味觉之苦，后两句陡然转入命运之苦，两相对照，由表及里，层层递进，令人感同身受。又如“四大脏”：“秃疮头，臊疮腿，茅坑大姐，骂人的嘴。”前三者为生理之脏，末句却是精神之脏，将物质与精神并置评判，折射出对不道德行为的深切厌恶。再如“四大损”：“骂聋哑人，踢寡妇门，踹瘸子大腿，挖绝户的坟。”四句以夸张之笔揭人性之恶，如四记重锤，痛击欺凌弱小的卑劣，鞭挞施虐者的灵魂。

记忆：渔船上的即兴接龙

年轻时出海打鱼，常听渔民歇息时即兴对起“四大”顺口溜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热闹里透着机锋，粗粲中带着快活。那场面如今想来，依然鲜活如昨。随手记下，竟也攒了数十条。

先说莱州湾的特产“四大鲜”：“三疣梭子蟹，中国大对虾，火管子竹蛭，白脸花蛤喇（文蛤）。”短短四句，藏着三层渔家门道：其一观物性，梭子蟹善潜泥沙，捕捞向来不易；其二熟厨事，竹蛭炖汤催乳，是沿海人家代代相传的食疗土方；其三溯旧史，明清年间对虾、文蛤皆为皇家贡品，寻常渔家吃到的，竟是旧时御膳房的滋味。

另有一味鱼肉版“四大鲜”，专挑鱼身上至美腴嫩之处：“加吉头，鲅鱼尾，河鲮（又名鲞鱼）身子鲫鱼嘴。”选鱼如选美，专挑最肥美的一寸，这番心得与胶东其他“四大鲜”顺口溜异曲同工，全是老饕用舌头丈量出来的。

再说“四大宽”：“铺着地，枕着山，数着星星，盖着天。”短短四句，道尽渔耕之人休憩时天为衾、地作榻的坦荡胸襟。寥寥几笔，便铺展开一幅天地辽阔的卧游画卷。

“四大小”极尽戏谑夸张：“苍蝇肝，蚊子胆，蚂蚁腰子，虱子的眼。”专挑虫豸身上微不可察的细碎脏器罗列，小至极致，却一本正经道来，透着一股顽童般较真的童趣。

还有“四大弯”：“驮篓圈，

碌碡挂，轱辘把子大对虾。”前三样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家运货、碾场、汲水的寻常农具，末句笔锋一转，由陆地风物落到海中大虾，转折出人意料，细品又忍不住会心一笑。

“四大难听”更是耳膜上的酷刑：“猫叫春，驴叫槽，钹锅铲子，锉锯条。”四种声响或是连绵凄鸣，或是尖锐摩擦，入耳便教人蹙眉，道尽凡人对聒噪刺耳之声最本能的抗拒。

谈及“四大不摸”，句句是代代相传的生存训诫：“蝎子尾，马蜂窝，老虎屁股，烧红的锅。”四样事物件件藏凶险，碰不得，惹不得，言语间满是老一辈传下的生活智慧。

“四大红”落笔浓烈鲜活，各色艳红杂糅人间百态：“关公面，红婚证，醉汉双眼，猴子臀。”有喜庆端正的红，有荒唐野趣的红，热热闹闹，揉尽市井烟火与山野意趣，斑斓生动。

“四大欢”则写尽万物蓬勃生机：“十八少女，上路驴，顺风红旗，逆水鱼。”少女明媚无忧，耕驴奋力奔走，红旗迎风舒展，游鱼逆流腾跃，每一种欢喜，都是生灵最本真热烈的模样。

反观“四大蔫”，气韵骤然低沉落寞：“风摧麦穗霜打草，输钱汉子，笼中鸟。”或是天候摧折草木，或是世事困顿人心，一个“蔫”字，道尽气力耗尽后的颓唐与无奈。顺口溜起落之间，藏着海风、烟火和渔人眼里的人世百态。

传承：永不落幕的民间诗会

“四大”顺口溜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。简简单单几句话，容纳多少人情世故，道尽几多世事沧桑。几十年后，当我重新翻开那个泛黄的笔记本，鲜活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。只是，当时一起说笑的人早已离去，时光流逝竟是如此之快！然而，再快还能快过“四大快”——“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，天上的流星，催命的鬼”吗？想到这儿，我哑然失笑。

时至今日，有些老顺口溜已经过时，新的“四大”仍层出不穷。在短视频平台上，各种“四大狠人”顺口溜获得百万点赞。网络版的“四大怪”：“男想高，女盼瘦，狗穿衣裳，人露肉”，用蒙太奇式的拼贴与戏谑口吻，解构着消费时代的浮华。反腐题材的

“四大毒药”：“酒是穿肠砒霜，色是刮骨钢刀，气是下山猛虎，钱是惹祸根苗”，将劝诫功能与舆论监督融为一体，在承续经典结构的同时，不断吸纳新的时代元素。

从北宋的“四喜诗”到如今的抖音网红，从渔船上的即兴接龙到学术论文的修辞分析，“四大”顺口溜始终游走在雅俗之间。它既是百姓的精神慰藉，也是文化研究的鲜活样本，更是中华语言艺术的微型基因库。当我们细细品味“四大嫩”中“头刀韭菜，香椿芽，十八的姑娘，顶花的黄瓜”的鲜活生动，便能触摸到一个民族永不枯竭的创造力。这种扎根生活的语言艺术，必将在时代变迁中生生不息，历久弥新。